

日本在败降过程中维护天皇制的活动

徐康明

天皇制是日本独特的国家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在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在位长达62年的昭和年间(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其动荡的激烈和变化的深刻，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1945年8月15日本战败投降为分界，昭和年代前20年的历史，是在总揽国家大权的裕仁天皇的指导和纵容下，日本对内逐步建立起军国主义法西斯体制，对外在亚洲太平洋区域发动侵略战争的罪恶史。其间根本没有什么“昭明”与“协和”，反而充斥着压迫与侵略。日本战败投降后，迫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日本的天皇制发生了重大变革，由战前和战时的专制君主制变为战后的象征天皇制。这一变革是战后初期日本民主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它顺应世界形势的发展潮流，符合日本人民的要求，对日本战后的复兴、繁荣和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同世界历史上一切改革一样，日本天皇制的变革，遭到了行将退出而又不甘退出历史舞台的军国主义势力的拼命反对。在日本败降前后，围绕对天皇专制制度是全盘维护还是加以变革，发生了一系列曲折复杂的事件。操纵日本军政大权的军国主义统治集团，为了达到“维护国体”，即保留天皇专制制度的目的，在求和过程中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进行活动，力图开脱带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最高领导人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阻碍日本人民和国际舆论彻底批判并清算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侵略罪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有一些老军国主义分子及其新的追随者，一有机会就跳出来肆意歪曲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追根溯源，这与当

年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大肆进行维护天皇制的活动，逃避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彻底清算有很大关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揭开半个世纪前日本统治集团拼命维护天皇专制制度的活动真相，有助于扫清日本军国主义的残余影响，总结曾给人类造成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对于维护亚洲太平洋区域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败降前的挣扎：“以战求和，维护国体”

1931 年，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出兵侵占中国东北；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在短期内独占中国；为了摆脱侵华战争长期化的困境，它先试图北进侵苏，欧战爆发后又决意南进。这一系列侵略行动，无不得到裕仁天皇的鼓励和批准。日本军政当局在裕仁天皇亲自指导下，于 1941 年对发动所谓“大东亚战争”反复策划，“最后天皇决定对美开战”。^① 在 12 月 1 日的御前会议上，根据裕仁的决定，通过了《对美、英、荷 开战案》。^② 会议结束后，裕仁天皇鼓励陆、海军两总长：“这样做是不得已的，望陆、海军双方合作，努力干。”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特别注意到当时“陛下神色极为爽朗”。^③ 12 月 8 日（东京时间）、日军偷袭珍珠港，进攻马来亚、菲律宾等地，挑起了太平洋战争，使日本自 1931 年以来发动的侵略战争达到最大规模。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日军虽然在太平洋战场上暂时取胜，但由于战线拉得更长，有限的兵力更为分散，日本未能走出侵华战争

① 《木户幸一日记》，1941 年 12 月 1 日，木户日记研究会校订，东大出版会 1966 年版。

② 开战案载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940—1945）》下卷，1969 年再版本，《文书》第 564—569 页。

③ （日）参谋本部编：《杉山笔记》（上），原书房 1967 年版，第 543—544 页。

的泥潭，却要在太平洋战场上与实力雄厚的美国周旋，并面临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广泛抵抗。因此它虽然在战术上赢了一着，但在战略上却陷于全局被动。

随着战局发展、形势开始逆转，开战初期昙花一现的胜利暂时掩盖的各种矛盾日益暴露。日本统治集团各派势力之间争权夺利，互相攻讦日益激烈，并形成以木户幸一、近卫文麿等重臣元老为主的所谓“主和派”和以首相东条英机为首的所谓“主战派”两种方针之对立。战后，某些欧美和日本史家把主张“保卫战果和平论”的天皇、重臣和宫廷官僚称为“稳健派”或“主和派”，极力为之涂脂抹粉。其实，所谓“主和派”同以军部为核心、以东条为代表的主战派”并无本质差别和原则分歧。主和派一开始就为保存天皇制进行策划。1943年2月14日，木户与前首相近卫文麿密商。“他们一致认为要最充分地利用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同时要宣扬如下思想：如果在日本战败后的灾难时刻废除天皇制，日本人民就会变为共产党。”^①

裕仁对战争前景进行了反复思考。1944年1月4日，他告诉木户：一方面，为了国家的荣誉，他希望将战争进行到底；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生存，他希望要为战败制订一个周密的计划。^②木户很快在1月6日提出一份备忘录，强调日本一定要避免在战败时进出现诸如意大利的巴多里奥政府，日本政府始终要服从天皇的命令，寻找一条通往和平的途径。他打算撤换越来越不得人心的东条内阁，由继任的内阁根据天皇的指示，统一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完成实现和平的特殊使命。木户认为：“我方只有大大让步，敌方才会接受”。^③面对日本不可避免的战败结局，裕仁着重考虑的是“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被孤立”。他认为“我们最好的出路是在国

①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下册，伦敦威廉海涅曼出版公司，第982页。

② 《日本天皇的阴谋》下册，第997页。

③ 《木户幸一日记》，1944年1月6日。

内秘密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维护我们对抗美国的大英帝国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力量的立场”,“展望世界的未来趋势,我深信我们必须花一百年左右时间来维护和培植我们国家的实力”。^①此后,日本统治集团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开展求和活动,千方百计保存实力,以便战后东山再起。

1944年,美军不断增强实力,以巨大优势从中太平洋和西太洋两路连续展开强大攻势进逼日本要绝对确保的防卫圈;中国解放区战场的抗日军民开始进行局部反攻;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美英盟军配合下相继反攻缅北、滇西,入侵印度英帕尔的日军全军覆没;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日益高涨;日本的战争经济濒于枯竭。日本一旦战败时如何维持天皇制度和裕仁的地位,成为日本统治集团的首要考虑。1月17日,近卫同皇后的叔父东久迩亲王商谈时,一致认为“在战局最坏的情况下,如果日本战败,也必须维护天皇的地位”。^②此后,统治集团按照“以战求和,维护国体”的方针开展军事和外交活动。

美军于6月大举进攻中太平洋上屏障日本本土的“防波堤”马里亚纳群岛,突破了日本要绝对确保的防卫圈的中心环节。随后,美军迅即在马里亚纳诸岛建立海空基地,直接空袭日本本土。

日军在马里亚纳之役的惨败使东条内阁成为朝野攻讦的众矢之的。裕仁为了维护作为天皇致高无上,一贯正确的形象,决定将东条作为替罪羊加以抛弃。经过木户的幕后策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东条被迫于7月18日宣布总辞职。经重臣会议推荐,天皇下令由朝鲜总督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和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联合组阁。新内阁于7月22日就任。

在倒东条中起主导作用的重臣集团的希望是,通过政权更迭

① 《日本天皇阴谋》下册,第998页。

② 《东久迩日记》第217页。转引自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9页。

打开走向和平的道路。但他们对形势既然无清醒的估计,也无实现和平和具体方案。小矶组阁时的指导思想是纠集全力打一个大胜仗,作为停战求和的本钱,然后不失时机地结束战争。米内也认为新内阁的任务是继续推行战争,和平应交给下届内阁来搞。因此,这届内阁仍然立足于“以战求和,维护国体”的方针。为了克服国务与统帅二元化的固有矛盾,实现有效的战争指导,小矶建议将不定期召开的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改为在皇宫内定期举行由天皇亲自主持的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其成员是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陆海军总长。在意见不一致时,由天皇作出最后决断。8月19日,战争最高指导会议通过新的战争指导大纲,进行负隅顽抗的作战部署,同时提出“密切注视世界各国的动向,与作战相呼应……采取积极坚定的对外政策,力求争取世界战局政局的好转”。^① 对外政策的重点是争取改善日苏关系和继续进行所谓“对重庆的政治工作”。

在小矶内阁中留任的重光葵外相,根据战争指导大纲确定的“继续维持中立关系,进一步谋求日苏邦交的好转,并努力实现德苏议和”的方针,开展对苏外交,并作好“万一德国崩溃或单独媾和时,应不失时机地利用苏联,努力使形势好转”的准备。^② 根据重光的建议,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决定派前首相广田弘毅为特使赴苏谈判,准备作出一系列让步以改善日苏关系。苏联已承诺在击败德国后参加对日作战,拒绝了日本遣使赴苏。

在中国,日本军事与外交双管齐下:一面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在豫湘桂战场上发动大规模攻势,一面开展所谓“对重庆的政治工作”。9月5日,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制订的《对重庆工作实施方案》,企图以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美英与日本均从中国撤军等条件为诱饵,达到“使重庆政权迅速停止

①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第601—604页。

② 该大纲全文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第604页。

对日抗战”，并承认不改变伪“满洲国”现状的目的。^① 日军虽在豫湘桂战场上大败国民党军队，侵占了大片地区，但已是强弩之末，难以持久。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展表明，日本早已丧失了讨价还价的实力和机会，重庆国民政府也不可能在此时接受日本的谋“和”。

台前的小矶内阁对苏、对华的外交试探连连碰壁，在军事上集中全力于1944年下半年进行决战的部署也在菲律宾战役中被彻底粉碎。小矶在莱岛之战前曾大肆鼓吹：“莱特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在那里进行争夺天下的决战”。日军在莱特一役中惨败后，天皇质问小矶：“你说莱特决战是胜负的关键，这下子你可怎么办呢？”小矶无言以对，只能向天皇谢罪。^② 在此期间，幕后的“主和派”核心人物近卫等人也多方设法对美、英进行外交试探。9月中旬，近卫授意《朝日新闻》社长铃木文四郎，通过瑞典驻日公使巴格请瑞典政府将近卫等人起草的和平建议转交给英国。对方传回的信息是要日本无条件投降。铃木对巴格表示：“无条件投降是对和平的一大障碍，因为每一个日本人都宁愿战斗到底，而不愿看到天皇蒙受羞辱。”^③ “以战求和，维护国体”，仍然是他们恪守的既定方针。

进入1945年之后，日本在军事上已陷于绝境，战争经济也已山穷水尽，统治者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在为如何才能达到“维护国体”，即保证现存的天皇专制体制这一首要目的而苦思焦虑。围绕这一要害，两派对如何才能达到目的产生了分歧。“主战派”认为如在此时求和，势必要接受敌方无条件投降的要求，结果必然导致国体的变革，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他们利用控制大本营和政府军政实权的有利条件，操纵战争最高指导会议，

^①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第605—606页。

^② 小矶国昭自传《葛人鸿爪》第808页。转引自井上清：《天皇的战争责任》，第180页。

^③ 巴格的证词，见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记录》第34559—34561页。转引自《1942—1946年的远东》，第127页。

在 1945 年 1 月接连制订了《紧急施政措施纲要》、《决战非常措施纲要》等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紧急措施，摆出“本土决战”的架势，叫嚣“一亿玉碎”，不惜以牺牲全国人民来进行最后顽抗。“主和派”则认为，不应再将这场已经打输了的战争继续拖延下去，否则将会引起一场比战败更危险的左翼革命，动摇国体的根本。因此他们主张设法尽快与美英妥协，在确保“维护国体”的前提下结束战争。

1945 年 2 月，美军大举进攻硫磺岛，战火更加逼近日本本土。首都东京和全国各地遭到愈来愈频繁的空袭。2 月 3 日，美军攻占马尼拉，驻守菲律宾的日军第 14 方面军全军覆没。苏联则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将在德国投降 3 个月后出兵参加对日作战。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崩溃的日子日益临近。裕仁天皇于 2 月 7 日至 26 日逐一召见重臣，听取他们对收拾败局的意见。近卫在 2 月 14 日应召上奏说：“战败虽在我国国体上留下污点，但英美舆论至今尚未进而提及改变国体问题。因此，如果仅就战败而言，尚无须为国体而忧虑。从维护国体的立场来说，最堪忧虑的，与其说是战败，毋宁说是由于战败而可能引起的共产主义革命。”“从维护国体的立场来说，必须研究尽早结束战争的方法与途径。”裕仁问道：“美国说要取消皇室，对这一点作何理解？”近卫回答说：“根据格鲁及美国领导者的意见来看，我想还不至于如此。”裕仁表示：“梅津（参谋总长）说，美国取消皇室的论调没有缓和，所以应该彻底抗战，我对这点有所怀疑。”又说：“听梅津和海军说，这次如能把敌人诱至台湾，就能给予打击，我想在那以后再采取外交手段也好。”^① 裕仁天皇在征询了文武要员的意见后，作出了继续坚持“以战求和，维护国体”既定方针的重要决断。“主战派”与“主和派”分别是裕仁推行其决策的左膀右臂。主战的军部头目全力加紧准备本土决战。主

^① 细川护贞：《情报没有上达天皇》上卷第 336—337 页。转引自井上清《天皇战争责任》，第 182 页。

和的宫廷和官僚继续设法进行求和试探。近卫等人在3月拟定了一个《和平交涉纲要》，策划“积极努力由苏联调停而达到交涉的成功，但在万一归于失败时，立刻开始与美英直接交涉”。纲要强调“维护国体是绝对的，一步也不能退让。”^①以裕仁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在明知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利用天皇的权威，顽固地拖延战争，使日本国土在此后半年间遭到本可避免的巨大破坏，无辜民众惨遭无谓的重大牺牲。东京和日本其它58个城市遭到美军飞机有计划的大规模轰炸，数十万平民死于非命。仅3月9日的东京大轰炸中被焚毁的房屋即有数万间，伤亡78650人，比5个月后长崎遭到原子弹轰炸，日本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还多500人。在美军飞机对东京的多次空袭中，裕仁及其家属始终安然无恙，因为美军空军司令李梅向所有飞行人员下达明确指示，要他们不得袭击皇宫，理由是“日本天皇目前并不是一个包袱，将来可能成为可资利用的宝贝。”^②

美军于4月1日发动冲绳战役。上台不到一年的小矶内阁欲战无力，欲和无路，焦头烂额，只得在4月5日辞职。重臣会议推荐枢密院议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出来收拾残局，组织“终战”内阁。年近八旬的铃木是日俄战争的老将，曾任裕仁天皇的侍从长，1936年的“2·26”事件中遇刺重伤而暂时退隐。因此，铃木既是天皇亲信，表面上又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毫无关系，而且当年他在海军服役时，日本是英国的盟国，美国的朋友。重臣们推荐铃木出任首相，“是向英美两国表示和平愿望的一个姿态”。^③对铃木内阁的其它要职也作了精心安排。“主和派”干将米内光政留任海相，邀请东乡茂德重新出任外相。铃木对东乡说：“对战争前途的看法您的意见是对的，外交大致也请按您的意见进行。”^④

① 矢部贞治：《近卫文爵》，弘文堂1952年版，第560页。

② 《日本天皇的阴谋》下册，第1039页。

③ 《1942—1946年的远东》第130页。

④ (日)外务省编：《终战史录》东京1952年版，第285页。

铃木内阁上台之日，正好是苏联通知日本两国中立条约到期后不再延长之时。苏联的通知，使铃木倍感形势之严峻，但仍然在就职演说中宣称：“必须以任何手段打赢战争。”^① 主持求和外交的东乡外相也对军方表示：“如果日本能在冲绳击败敌人，苏联和其他国家即将承认日本的战力尚有相当余裕，并且敌人方面要采取攻势也需要若干时间。日本可以利用这种时机为到处碰壁的外交活动建立基础。”^② 铃木内阁仍然是换汤不换药，坚持奉行“以战求和，维护国体”的既定方针。

冲绳之役是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水陆两栖战役。尽管日军以所谓海上和空中“特攻”进行拼死抵抗，并胁迫 10 余万岛民“玉碎”，使美军付出重大代价，该岛仍然在 6 月底失守。美军经此一役，打开了进攻日本主岛的大门。铃木内阁希冀以冲绳一战的胜利赢得喘息时机，部署外交活动的企图被彻底粉碎，

冲绳战役开始之时，欧洲战局已临近尾声。4月 28 日，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被反法西斯义勇军处决并暴尸街头。两天以后，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在苏军攻克柏林的炮声中，以卑怯的自杀来逃避世界人民的严厉制裁。裕仁天皇统治下的军国主义日本，陷入了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彻底孤立境地。为了稳住阵脚，日本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在希特勒自杀的同一天（4月 30 日）炮制了《在德国屈服的情况下对德对策纲要》，叫嚣“在德国屈服的情况下，抑制国内的动摇，与领导的精心处理的同时，在一亿坚如铁石的团结之下，确立必胜的信心，保卫帝国领土，采取新的措施，务求达到战争的圆满结束”。^③ 这不过是力竭心虚的日本军政头目自我壮胆而已，除了老调重谈之外，拿不出什么切实有效的新措施来。5月 8 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二天，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色厉内荏

① 加濑俊一：《通往密苏里号的道路》第 151—152 页。转引自朱贵生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97 页。

②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 4 卷，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24 页。

③ （日）参谋本部：《战败的记录》，1967 年版，第 254 页。

的声明，宣称“欧洲战局的急剧变化，对帝国的战争目的不会发生丝毫改变”。^①

急于寻求出路的日本统治集团寄希望于通过苏联打开和谈大门。4月20日，东乡外相对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表示：“日苏友好关系是唯一的光明所在，我希望它将驱散乌云，成为使世界和平必将到来的核心。”^②根据东乡的建议，战争最高指导会议于5月11、12月和14日连续开会，着重讨论对苏政策。会议强调以外交手段防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会议通过的由东乡起草的《日苏谈判要领》指出：“如果苏联参战，必将制帝国于死命。因此，对英美的战局不论如何演变，帝国都要竭力防止苏联参战”，“并应进一步取得苏联的友好中立，更进而争取苏联对结束战争，为我方作出有利的斡旋较为有利。”^③5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废除业已变为一堆废纸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三国公约》等同德、意签订的所有条约，以甩掉这些妨碍日苏关系的历史包袱。日本当局争取苏联出面斡旋的如意盘算，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除遭对方冷遇外，未有更好的结果。

与此同时，日本还在瑞士、瑞典和葡萄牙等欧洲中立国通过各种渠道同美、英接触，互相摸底并讨价还价。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日本驻瑞士的外交官同美国战略情报局及欧洲负责人艾伦·杜勒斯关于日本投降条件的交易。日方提出的条件是：要求同盟国改变无条件投降政策：天皇制不得侵犯；满洲由国际共管；朝鲜和台湾仍归日本统治。这些条件是对《开罗宣言》的公然对抗。杜勒斯将日本的条件报告华盛顿当局，并把美国的想法转告日本官员：虽然美国希望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并使之不受侵犯，但是由于苏、中等国表

①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第611页。

② [苏]C·A·戈昂斯基等著：《外交史》第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的外交活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75年版，第711页。

③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74—1575页。

示异议，所以不能以书面形式承担这一义务。他们只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日本投降，天皇制应该维持下去，但宪法应当修改。杜勒斯还表示，如果日本在苏联参战之前还不开始同美国谈判，那末它想缔结妥协性和约的意图就要落空。^① 美、日在瑞士进行的秘密交易长达数月，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与批评，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于 7 月 10 日发表声明，否认美、日官员在瑞士进行非正式谈判的事实，并保证“美国政府的政策将一如既往，立足于要求的日本无条件投降”。^② 由于在欧洲各中立国的秘密外交活动大多已经泄漏消息，东乡外相断定这类接触除无条件投降外，得不到其它结果，决意放弃这些活动，集中开展对苏外交。

日本军政头目在 6 月 8 日的御前会议上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是：“对帝国说来，现在战局极为紧迫，欧洲盟邦已经崩溃，苏联的对日动向也要严重警惕，帝国正处于存亡的关键时刻，而敌方也满怀苦恼，正急于在短期内结束战争。”^③ 据此制定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将战略和政略的重点都放在“本土决战”之上，摆出“利用地利人和，战斗到底，以此维护国体，保卫皇土”的强硬态度，同时“力求迎合世界形势转变的时机，灵活有力地推行对外政策，特别要着重对苏对华的政策，以有利于进行战争”。^④ 铃木首相要求“政府和统帅部团结一致，竭力使其实现”。^⑤ 铃木内阁为动员全国的力量准备本土决战，于 6 月 9 日召开了第 87 届国全非常会议。会上竭力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通过了《战时紧急措置法》和《义勇兵役法》，使政府获得了不受其它法令限制采取战时紧急措施的权力，企图将“国土的万物万象统统化为战力”来“维护国体，保卫皇土”。

在幕后操纵政局的木户内大臣认为制定以本土决战为重点的

① 《终战史录》，第 301—302 页。

② 《美国国务院公报》第 13 卷，第 84—85 页。

③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第 614 页。

④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第 615—616 页。

⑤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09 页。

战争指导大纲，是主战派空虚逞强的结果，将会错过尽快谋和的时机，遂抛出一个以停战谋和为重点的《收拾时局对策草案》。木户在草案中承认，日本在“今年下半年以后，事实上将完全丧失进行战争的能力”，并“将引起人心的严重不安，事态将立即发展成为不可收拾”。因此，“为了收拾战局，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即由天皇亲自出面，“违反历来的惯例，作出英勇决断”，派遣特使“奉天皇陛下的亲笔信同斡旋国进行谈判，请求现尚处于中立关系的苏联代效调停之劳”，争取实现“体面的媾和”。^① 裕仁天皇 9 日下午听取木户上奏后，当即赞成并谕令从速执行。木户秉承天皇旨意，在国会会议结束后立即进行游说，相继征得首相、海相和外相的赞同，并委托东乡外相加紧制定具体方案，最后又说服了阿南陆相，从而取得了内阁主要成员的支持。6月 18 日，铃木首相将木户的谋和方案提交战争最高指导会议讨论。陆、海军总长和陆相仍主张在本土决战取得战果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会议决定：“只要美、英坚持绝对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就有必要继续战争；但当我们尚拥有相当军事力量期间，通过第三国，特别是通过苏联倡议媾和，使美、英至少承认包括维护国体条件在内的和平，较为适宜；在 9 月份以前，能够实现停战最为理想；因此，要求在 7 月上旬以前，把苏联的态度侦察清楚，以便尽快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② 决定表明，日本政策的重点已从准备本土决战为主变为进行谋和外交为主。“主和派”由于取得天皇的支持正在逐步得势，但以军部头目为代表的“主战派”在决策层中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

6月 21 日，冲绳守军全军覆没。消息传来，裕仁天皇感到战局的无望和谋和的紧迫。第二天，他召见战争最高指导会议成员面谕：“关于战争指导，前在御前会议上虽已作出决定，但在另一方

① 《木户幸一日记》，1945 年 6 月 8 日。并见《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12—1614 页。

②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16 页。

面,关于结束战争问题,此时也希望不拘泥于历来想法,从速进行具体研究,力求促其实现。”^①这是裕仁天皇首次明确要求军政主要领导人优先进行谋和外交。铃木首相表示:“自当秉承御旨,努力求其实现。”其它军政要员也在天皇逐一询问下表态。裕仁天皇这次面谕,对统一军政当局的意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铃木在会后说:“陛下今天把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坦率地说了出来,真是惶恐之至。”^②木户、近卫等“主和派”核心人物一年前就着手策划,在铃木组阁时暗示过的“以天皇的圣断”停战谋和的计划,终于开始付诸实施了。

为了执行天皇的决策,铃木内阁在 6 月下旬恢复了广田—马立克会谈。广田在会晤中一再表示,日本愿为改善日苏关系作出一系列重大让步。马立克一如既往地表示冷淡,最后干脆托病不见。驻苏大使佐藤在莫斯科的活动同样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正当日本当局徒劳无功地开展对苏外交活动时,中、苏在莫斯科会谈和苏、美、英三国首脑即将在波茨坦会晤的消息相继传来。这预示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使日本统治集团更加惊恐。7月 7 日,天皇召见铃木,督促他加快同苏联的交涉,迅速派出携带天皇亲笔信的特使。12 日,天皇授命近卫为特使。同日,东乡急电佐藤请求苏联同意接待近卫。电文以天皇的名义表示“希望迅速结束战争”,但“只要美、英坚持无条件投降,帝国为祖国的荣誉与生存计,只好举国一致,战斗到底”。^③波茨坦会议于 7 月 17 日开幕。18 日,苏联政府复照日本,表示“对于天皇通电以及近卫出使的问题,不能作出任何确定答复”。^④

日本统治集团此时好似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将请求苏联出面

① 《木户幸一日记》1945 年 6 月 22 日。并见《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16 页。

②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17 页。

③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20 页。

④ 戈尼昂斯基等著:《外交史》第 4 卷,第 845 页。并见《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22 页。

斡旋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拼命想抓住它。日本当局在收到苏联的答复后仍不死心。东乡外相于 21 日夜间电令佐藤通知苏联政府，“近卫特派使者的使命，是奉天皇意旨，请求苏联尽力斡旋和平，以结束战争，面陈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意图，同时商谈包括建立战时及战后作为帝国外交基础的日苏合作关系事宜”。他另电指示佐藤：“我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如果敌人一定要求无条件投降，则我们只有全国一致，共同对敌。但为仰体圣意，避免发生上述情况，故请苏联斡旋，以寻求并非敌人所谓无条件投降的和平。”^① 不过这一建议仍然遭到苏联拒绝。

二 在维护天皇统治权的前提下投降

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以中、美、英三国的名义于 7 月 26 日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日本军政头目对是否接受公告发生了重大分歧。东乡外相认为：“发出这一公告的美、英、中三国，已放弃以前的绝对无条件投降的主张，代之提出了同日本建立和平的八项项目的特定条件。无条件投降一词，在这个公告中只使用过一次，而且明确规定只适用于日本武装部队。”“条件无疑是苛刻的……但鉴于目前战局的极端恶化，这已是日本所能希望得到的最大限度的条件。”^② 东乡还认为，由于苏联并未参加发布公告，在法律上仍同日本保持中立，因此还有可能通过苏联调停，放宽公告的条件。于是东乡力主不要急于拒绝公告，以便留下交涉的余地，等待苏联的态度明朗后再作决定。27 日的内阁会议同意了东乡的意见。

军部头目不肯正视日本已经走到穷途末路，继续坚持本土决战，顽固拒绝接受公告。铃木首相在 28 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宣

①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22 页。

②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30—1631 页。

称：“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认为它并无任何重大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我们唯有坚决地把战争进行到底。”^① 同盟国认为铃木声明是日本官方正式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表示，决定加强对日攻势。日本军政头目的顽固和愚蠢之举，使日本人民在战争结束前夕蒙受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惨重牺牲。

8月6日，美国的原子弹将广岛夷为一片废墟。日本统治集团对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犹豫迁延，对日本人民遭受原子灾难负有罪责。

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冲击，但并未收到迫使日本当局立即投降的效果。军部竭力封锁来自广岛的消息，反对东乡外相关于讨论结束战争问题的建议。从6日到8日，战争最高指导会议都未开会讨论美国投掷原子弹之后的对策。只有东乡外相于8日下午向裕仁天皇面奏了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的情况。天皇面谕：“敌方既然已经使用这种武器，继续进行战争更加不可能了。为争取有利条件，不能丧失结束战争的时机。条件还可以进行协商。应该努力争取尽快结束战争。”^② 尽管局势危殆，时机紧迫，裕仁还要指示进行讨价还价，争取更有利的条件。

此时，日本统治集团的目光仍然集中注视着莫斯科的动向，对苏联政府在最后一刻同意出面斡旋抱着一厢情愿的幻想。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宣战声明，这给数月以来一直盼望苏联出面调停的日本统治集团当头一棒，使其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8月9日，远东百万苏军兵分三路，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强大攻势，随即又向朝鲜北部和库页岛进军。兵力早已十分空虚的日本关东军迅速溃败。

苏联对日宣战后，“主和派”认为，“当前只有接受波茨坦公告，

① 《朝日新闻》1945年7月30日。

②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637页。

才能保持国体”。^①木户和东乡等人四处活动。9日上午，东乡先后拜会铃木首相和米内海相，商议召开战争最高指导会议决定停战。他还谒见了皇弟高松宫，急取皇族的支持。木户则向天皇申述了必须迅速停战的意见，并秉承天皇意旨同铃木首相进行了商讨。“主和派”要人经过一番紧张策划，于当天上午10时30分召开战争最高指导会议。与会的内阁四相和军部两总长面对严峻的现实，不得不同意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对提出哪些附加条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东乡外相主张只提“维护国体”一个条件。铃木首相和米内海相支持东乡的意见。陆相阿南惟几、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贞次郎则坚持除了“维护国体”这一条之外，还要增加由日本自行处理战犯、自主解除武装以及同盟国军队不得进驻日本本土等三个条件。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会议陷于僵局，直到下午1时仍无法消除分歧，只好将问题移交内阁会议审议。其间传来了美军在长崎投掷第二枚原子弹的消息。内阁会议从下午2时30分开始，主张只提一个条件的与主张要求四个条件的阁员又进行了7个小时的争论，仍然不能取得一致。由于两派主张僵持不下，铃木只得奏请召开御前会议作出裁断。“主和派”对此已经预作安排，高松宫、近卫和前外相重光葵等人已通过木户内大臣将只提一个条件和增为四个条件的利弊上奏天皇，并“仰求圣断”，使天皇作好准备。

“主和派”精心策划的御前会议于9日深夜11时50分在皇宫的防空洞里召开。争论双方分别陈述意见后，铃木首相请求天皇作出决断。裕仁天皇当即表示采取外相的一个条件方案，并说明理由是：“虽然一直尽听有取胜自信的话，但是到现在为止，计划和实践并不一致。又据陆军大臣说，九十九里滨^②的防御工事要在8月中旬完成，但是还没有完成。即使编成了新的师，但是应该发给他们

① (日)外务省编：《终战史录》，第560页。

② 指日本千叶县东境的海滨。

的武器还没有备齐。这个样子，要对付拥有那样机械化程度的美、英军队，没有胜利的希望。”裕仁安抚始终顽固主战的军部头目说：“军人是朕的股肱，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并把朕的臣下作为负战争责任的人引渡出去，这是不能忍受的事。但为国家前途计，亦属事不得已。在大局上应效法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时所作的决断，忍其所不能忍。”^① 这是天皇舍车保帅的自白。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亲自拍板决定的方案是：“日本政府根据这样的理解——在上月 26 日的三国联合公告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改变天皇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而接受这个公告。”^② 裕仁天皇表态之后，铃木首相宣布当以天皇的决断作为这次会议的结论。会议结束时已是 8 月 10 日凌晨 2 时 30 分。因举行御前会议而暂时休会的内阁会议于 3 时左右复会。东乡外相报告了御前会议通过的提案，并与铃木首相共同强调指出，这是天皇的亲自决断。全体阁员再无异议；在文件上签字之后，于 4 时左右散会。

8 月 10 日上午，日本外务省按照事先准备，将日本政府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迅速电告日本驻瑞士和瑞典的公使，请两个中立国政府转达给美、英、中、苏四国政府，要求尽快得到答复。同时在东京直接递交苏联驻日大使。照会虽然同意接受美、英、中三国共同公告，但提出附加条件，即“上项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权力的要求。日本政府竭诚希望这一谅解获得保证，并切望迅速得到对此的明确表示”。^③

这是对波茨坦公告作实质性的重大修改，以满足日本关于维护天皇制的既定目标。美国在明知日本对接受波茨坦公告提出重要先决条件和情况下，一手把持了对日交涉。国务卿贝尔纳斯于 8

①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第 631 页。

②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第 627 页。

③ 照会译文录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317 页。并参照《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第 631—632 页及《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52—1653 页所载照会全文。

月 11 日代表同盟国答复日本：“自投降之时刻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即须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按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确定之”。^①这个答复体现了美国政府保留、控制、利用日本天皇制的意图。它在实际上承认了天皇及其政府在占领军司令官控制之下统治国家的权力，又含蓄地表明了战后保留天皇制的可能性及其途径，从而基本上满足了日方对于维护天皇制的要求。

日本政府一面向同盟国家发出讨价还价的照会，一面对本国公众隐瞒求降的真情，继续鼓吹本土决战，煽动战争狂热。在 8 月 10 日下午 2 时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反复讨论了应在何时并如何向国内公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最后决定由天皇颁布大诏来向国民公布，在此之前暂不发表。下午 7 时向全国广播情报局总裁的谈话，宣称：“为了确实捍卫最后一线，以维护国体，保持民族荣誉起见，政府正在进行最大努力，同时也期望一亿国民克服一切困难，共同为维护国体而努力！”^②话中突出了“维护国体”的主旨。第二天的晨报也刊载了这一谈话。同时，陆军大臣则发布了号召全军将士“纵令啮草啖泥，伏尸荒野，亦须断然奋战，相信死里自能求生”，即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将维护神州的圣战，坚决进行到底”的训示。^③在当晚 7 时的新闻节目中，陆军大臣训示和情报局总裁谈话同时广播，并根据阿南陆相的要求，在 11 日的报纸上并排登出。

日本政府收到美国代表同盟国的答复后，主要军政头目对是否接受仍然争论不休。12 日早晨，梅津和丰田两总长代表军部上奏反对意见，认为如接受同盟国照会即无法维护国体。同日，阿南陆相和梅津参谋总长联名通电，表明陆军认为同盟国的复照“违反

① 《国际务约集(1945—1947)》，第 104—105 页。

②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54 页。

③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54—1655 页。

维护国体本意，决定断然予以拒绝，仍坚持坚决继续战斗的态度。他们要求各军仍须坚决为完成作战任务而奋斗”。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亦从国体论的观点出发，表示反对接受同盟国的答复，并要求再次发出照会进行交涉。东乡外相、米内海相和木户内大臣等人则主张接受同盟国的复照。东乡认为，同盟国复照承认天皇的存在，而且按照日本国民的意愿，就不会导致改变国体。因此这一照会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日本再发照会继续交涉，将导致最后决裂。当天上午 11 时，东乡进谒天皇，奏明了同盟国答复的主要内容和对此准备采取的措施。裕仁天皇面谕：“我认为可以按照对方答复那样接受，并采取相应措施。”^② 他指示东乡将此意转告铃木首相。木户在东乡上奏后也向前来拜访的平沼枢密院议长表示：“有关对方复文的解释，只有凭信主管当局外务省来做，对此答复应按接受的方针来进行。”^③ 米内海相则质问并责备丰田军令部总长，为何事先不与海相商量就向天皇上奏反对意见。在当日下午的皇族会议上，裕仁天皇亲自说明了情况，全体皇族一致表示同心协力贯彻天皇的意图。但在同时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由于铃木首相的态度突然转变，表示支持军方的主张，使再次发出照会与同盟国交涉的意见在会上占了上风。东乡对铃木此举十分不满，提出辞职以示抗议。经木户等人从中疏导，铃木的态度又变回来，东乡也打消辞意。“主和派”的意见逐渐得势。“主战派”也四出活动，竭力争取支持。12 日晚 8 时许，阿南陆相趋访皇弟三笠宫，恳请尽力奏请天皇改变主意，遭到三笠宫斥责。13 日凌晨 2 时过后，外务省收到驻瑞典公使冈本的电报，报告美、英、苏之间就天皇制问题进行商讨的经过，指出同盟国复照是美国排除苏联反对的结果，实质上等于承认了日方所提的条件。^④ 这封电报加强了东乡外相的地位。外务省立

①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60 页。

②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60 页。

③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60 页。

④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62 页。

即呈递给铃木首相和本户内大臣。

为了讨论对同盟国复照的态度。战争最高指导会议于 13 日上午 9 时在首相官邸防空洞中举行。会上，陆相和陆、海军总长坚持主张要求修改复照中提出的条件，并提出补充条件。东乡外相表示反对。铃木首相和米内海相支持东乡外相的意见。会议进行到下午 3 时，两种意见仍不能统一，只好暂时休会。会议进行中间，东乡外相于下午 2 时入宫晋见天皇，上奏同盟国正式复文和 12 日以来的讨论情况。天皇面谕：“可按照外相的主张办理。”^① 他令将此意转告铃木首相。在下午 4 时左右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多数阁员虽然不满意同盟国的复照内容，但表示遵从天皇决定，赞同外相意见，只有阿南陆相继续坚持强硬的反对意见。铃木首相听取阁僚们的意见后，最后表示：“我到今天为止，始终抱着继续作战的决心。……但在再三反复体会来文中间，深感美国草拟这一文件并非出于恶意。表达方式虽有不同，实质上并无改变天皇地位意图……如果照旧战斗下去，纵设背水之阵，在已出现原子弹的今天，为时未免太晚。那样将不能维护国体……我想把今天的情况如实地再次奏明天皇，请求裁断。”^②

“主和派”策划再次召开御前会议，由天皇作出“圣断”。军部头目接受了上次御前会议的教训，设法推迟此次御前会议的召开，以便争取时间，说服军政要人同意再次发出照会与同盟国交涉的主张，但没有达到目的。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一些狂热的法西斯军人甚至准备动用武力来胁迫“主和派”要人答应他们的要求。武装政变计划得到阿南陆相支持，但因梅津参谋总长没有表示赞同，未敢贸然行动。

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由于意见分歧而陷于混乱。早已等得不耐烦的美国在广播中公开指责日本政府故意拖延答复，出动大批轰

① 同上书，第 1563 页。

②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64 页

炸机猛袭日本各地，并在东京等城市大量散发印有日本政府8月10日求降照会和同盟国复照的日文传单，把日本当局一直对国内严密封锁的消息公之于众。

在最后关头，裕仁天皇再次打破决策程序的惯例，亲自下令召开御前会议。8月14日上午11时，战时最后一次御前议在皇宫地下室举行。首先由铃木首相报告了军政要员们在各种会议上的争论情况，请天皇在听取反对意见后作出“圣断”。梅津、丰田两总长和阿南陆相声泪俱下地恳请天皇准许再次发出照会，如果不能得到维护国体的切实保证，就要继续进行战争，以期死里逃生。裕仁天皇听后表态：“我的异乎寻常的决心没有变。我不是轻率地作结论，而是根据世界形势、情况和彼我双方的国力战力来判断的。关于国体，敌方也是承认的，我毫无不安之处。关于敌方的保障占领，虽然不是没有一点不安情绪，可是，如果继续战争，无论国体还是国家的将来都会消失，就是母子都会丢掉。如果现在停战，可以留下将来发展的基础。”^① 天皇讲话时一再挥泪，戴着雪白的手套拂拭两颊的泪水。在场的文武要员呜呜咽咽，泣不成声。当天皇最后表示可以亲自广播，如有必要，随时准备站在麦克风前面时，全体与会人员不禁放声痛哭。中午，御前会议在悲泣中结束。接着召开内阁会议，起草停战诏书和给同盟国的复照。当晚11时，用急电将两个文件发往瑞士。天皇亲自在宫中宣读诏书进行录音，准备向全国广播。

8月15日中午，日本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天皇亲自宣读的停战诏书，这在日本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但在这个所谓“玉音广播”中，并无片言只字明确承认日本是战败投降，更没有对日本的侵略战争罪行表示丝毫悔过之意，反而振振有词地声称：“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把侵略说

^① 《战败的记录》，第290页。

成是自卫，其强词夺理的语调同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的宣战诏书如出一辙。停战诏书还以悲天悯人的语气表示，裕仁本人为了从“残酷之炸弹下”拯救“人类之文明”，“保全亿兆之赤子”，因此下令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诏书在最后宣布：“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他号召臣民“举国一致，子孙相传”，“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①这是裕仁利用天皇的特殊地位及其对日本人民的巨大影响，将“维护国体”作为既成事实，强加于反法西斯同盟和日本人民。

裕仁天皇在战争结束之前数月的一系列言行充分表明，他作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在最后关头亲自出马充当“终战”活动的主角，凭藉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一方面以所谓“圣断”统一藉统治集团的不同意见，达到舍车保帅的目的，另一方面又通过包括亲自发布停战诏书在内的各种手段，力图把“维护国体”作为既成事实肯定下来，从而在战后继续保持天皇的地位和权力。

天皇停战诏书公布前后，少数顽固主战的狂热法西斯军人（包括前首相东条的女婿和陆相阿南的义弟）杀死近卫师团长，煽动部分卫戍部队发动兵变，企图推翻铃木内阁，拥立一个主张本土决战的军部政权。14日深夜，一股叛军闯出皇宫搜查，要销毁天皇诏书录音，胁迫天皇改变决定。内大臣木户和宫内大臣石渡差点被叛军杀害。广播电台被占领。铃木首相和枢密院议长平沼的住宅15日被叛军烧毁。统治集团的绝大部分头面人物认为靠天皇“鹤声一鸣”宣布结束战争，是“维护国体”的最好办法，叛乱没有得到上层有力人士的支持和其它部队的响应，很快土崩瓦解。陆军三长官（陆相阿南、参谋总长梅津和教育总监土肥原）、航空总司令河边和杉山元、畠俊六两元帅均在《陆军坚决遵照天皇的决定行动》的文件上签字。但阿南、杉山和军令部次长、“特攻”战术的发明者大西泷治郎中将等十名高级将领在日本投降后由于绝望而自杀。这

^① 裕仁天皇停战诏书全文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文书》第636—637页。

些战争罪犯的可耻下场是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失败的反映。

三 败降后继续维护天皇制的活动

日本败降之后，以裕仁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继续明目张胆地大肆进行维护天皇制的活动。

天皇的停战诏书广播之后，外务省应陆军省 14 日的请求，于 15 日下午 3 时电告驻瑞士公使加瀬，请求瑞士政府转告美、英、中、苏四国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其中主要有：希望将同盟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的占领地点限于最低限度，并将东京排除在外；派驻的占领兵力，也希望限于象征性的程度；由日本军队根据天皇的命令自行解除武装；尊重日本军人的名誉，准许其佩剑，不将解除武装的日本军人用于强制劳役等。^① 这些要求是日本军方头目在败降前夕提出的由日本自行处理战犯、自主解除武装和同盟国军队不得进驻日本本土等条件的翻版。

8 月 15 日，铃木内阁宣布总辞职。当天夜间，铃木在广播讲话中宣称：他是“把帝国存在的根基天皇陛下统治大权不变作为条件”，并确信其无误，才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我坚信，只要圣天子在，宝祚永续，必定有开拓国运的途径”。他告诫国民：“不能认为战争一结束就会轻易减轻国民的负担和艰苦；相反，为了战后的赔偿和复兴，需要进一步忍受苦难和努力。”^②

铃木内阁辞职后，裕仁天皇再次采取前所未有的做法，未经重臣会议推荐，自行任命皇族东久迩稔彦组阁。皇族入阁是明治制定宪法以来没有先例的。此举意在向国内外显示天皇的权威及其不可替代的地位，牢牢控制国内局势，以便进一步同美国占领当局讨价还价。8 月 17 日，东久迩内阁就职，首相东久迩亲王兼任陆相

^①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72—1673 页。

^②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 4 册，第 1682—1683 页。

(8月23日由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大将接任陆相),米内海相留任,重光葵出任外相兼大东亚相,前首相近卫出任国务大臣,实际上是副首相。这是一个精心安排的维护天皇制的班底。东久迩在就职演说中只字不提战败投降,而是宣扬“托庇于国体之恩收拾战局”。^①这个本来应该以实施波茨坦公告为主要任务的内阁,却将“维护国体”作为压倒一切的最高使命。同日,裕仁天皇对陆海军人颁布敕语,对其“皇军”慰勉有加,把日本战败投降说成是“为维护我国光荣的国体,朕现欲与美、英、苏及重庆媾和”。他号召军人“克体朕意,坚持巩固团结,严明去就进退,克服千辛万苦,忍其难忍,以期保存国家永远之基础”。^②他还派皇族分头安抚国内外各地的日军。

为了开脱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责,达到维护天皇制的目的,东久迩炮制了一个混淆是非的“全体国民总忏悔论”。他在8月28日会见内阁记者团时,强调“捍卫国体是超越道理和感情的,是我们坚定的信仰”。他别有用心地说:“事到如今,说到责任问题,当然也由于政府的政策不够好,但国民道义衰微也是个原因。而今,我认为官、军、民等全体国民一定要彻底地反省、忏悔。”^③东久迩号召以全体国民总忏悔为全国团结和重建国家的第一步,企图让也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之害的日本人民替日本统治集团分担战争罪责,其用心何其毒也!9月4日,东久迩在第88届临时国会议上继续鼓吹其“总忏悔论”。议会通过“承诏必谨”的决议,同意了这一似是而非的论调,给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这种模糊侵略战争罪责的谬论,对战后的日本政局和社会舆论产生了十分有害的影响,妨碍了彻底揭露和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罪行,并埋下复仇情绪的祸根。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477页。

② 《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册,第1683页。

③ 富森馨儿:《战后日本保守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2页。

日本统治集团还抢在美军进占日本本土之前紧急处理物资，复员军队，销毁罪证和加强警察机构，以保存实力，压制民众，加强同美国占领当局讨价还价的地位。

美军进占日本前后，日本统治集团想方设法摸清占领当局的意图，以便采取对策。8月19日，陆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率代表团到设在马尼拉的麦克阿瑟司令部，商讨美军进驻日本的有关事宜。22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将战争最高指导会议改为停战处理会议，作为败降后的决策机构。26日，在外务省设立停战联络事务局，负责与占领当局联络。

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了日本向同盟国家投降的仪外式，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军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① 美国为此授予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极大的权力。美军进占日本之初，麦克阿瑟曾考虑过在日本实行直接军管。东久迩内阁得到消息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9月4日凌晨，重光葵晋见麦克阿瑟，表示美国“通过日本政府来实行占领政策，将是最为明智的策略”，日本将“诚心诚意地履行波茨坦公告”。他警告说，如果不这样做，“或许也就是混乱的开端，对此后果，日方不能负责”。麦克阿瑟“以理解的态度，颇感兴趣地听了这番话”。^② 他来到日本后，目睹曾经在太平洋战场各地拚死抵抗，使美军付出重大代价的日军，俯首贴耳地服从天皇的命令，迅速解除武装，让美军顺利进占日本，从而感到“天皇是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的力量”。^③ 既然日本政府表示愿意充当美国的驯服工具，麦克阿瑟遂改变初衷，决定通过日本政府进行间接统治。麦克阿瑟的这一决

① 美国国务院：《占领日本》附录13。转引自《1942—1946年的远东》，第500页。

② 重光葵：《昭和的动乱》下卷，中央公论社1952年版，第301—303页。

③ 井上清：《天皇制》，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4页。

定，使日本天皇制国家机器除军部之外，大部分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成为战后日本政权的基础。一大批官僚摇身一变，成为战后各级政府机构和积极保守政党的核心或骨干。

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国占领当局的信任与支持，裕仁天皇于9月27日屈尊前往占领军司令部拜会麦克阿瑟。会见中裕仁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战争责任。麦克阿瑟对裕仁天皇优礼有加，表示不但“这一责任显然不应由天皇来担负”，而且“占领的成功，有赖于天皇的真诚协助和影响力之处甚多”。^①他还说：“对日本国民及政界要人最清楚的，相信就是陛下了。希望今后听你的各种建议。”^②这次会见之后，麦克阿瑟进一步拿定主意，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协助美军实施占领统治，因此决定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不将裕仁作为战犯起诉，免予追究其战争责任的方针。1946年1月22日，麦克阿瑟接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通知，澳大利亚代表在伦敦的同盟国战争罪犯委员会提出了包括裕仁天皇在内的62名日本主要战犯名单。1月25日，麦克阿瑟致电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声称没有发现天皇犯罪行为的明确证据，因此不应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电报强调说：“给我印象至深的是，在停战前天皇虽然处理国事，但其责任基本上应自动归属于大臣以及枢密顾问官们。”^③他夸大其词地宣扬：如果将天皇作为战犯起诉，就有必要对占领计划进行重要的修改；为了对付日本方面的游击活动，起码需要一百万军队和几十万行政官员，还需建立战时补给体制。1946年1月19日公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章程规定，被告的选定最终须经盟军最高统帅批准。麦克阿瑟利用这一权力，保护裕仁天皇免于作为战犯被押上审判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美国人基南自1945年12月6日来到日本后，便按照麦克

①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② 《木户幸一日记》下卷，第1237页。

③ 粟屋宪太郎：《东京审判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阿瑟的意图，在法庭章程中有意删去了关于追究被告人责任的条款中提到国家元首的部分。^① 基南还在调查取证中有意回避涉及天皇战争责任的证据，最后又从检察局提交给麦克阿瑟的被告名单上去掉了裕仁的名字。

日本方面则按照舍车保帅的既定方针，千方百计地保护裕仁天皇。1946年4月18日，停战联络中央事务局公使大田三郎前往监禁日本战犯的东京巢鸭监狱探视前内大臣木户时，转达基南的指示：“绝对不得将陛下当作被告或者证人。”^② 由于美国实权人物的大力庇护和日本统治集团上下的全力包庇，在长达两年半（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的东京审判中，尽管有大量确凿证据说明裕仁天皇对批准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并未受到丝毫触动，在天皇宝座上安坐。

美军进占之初，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对占领当局的对日政策心中无数，惶惶不安。被美国占领当局为保持和利用天皇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使他们逐渐安下心来，并在惊魂甫定之后不断向占领当局靠拢。被美国占领当局视为“稳健分子”的天皇、皇族、重臣、官僚等策划了日本在维护天皇制的前提下投降的人们，在占领当局的庇护之下又形成新的权势集团。这一集团既是占领时期美国控制日本的得力工具，又是日本垄断资产阶级重建战后统治秩序的政治代表。从战前的旧保守政党脱胎而来的战后初期“新保守三党”（自由党、进步党、协同党），不约而同地在它们的党纲中将“维护国体”或“捍卫皇统”放在突出的地位。这三党就是在1955年合并建立的自由民主党的前身。战后初期，居于日本政坛主流的保守

^① 钮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章程第7条规定：“无论是国家元首还是居政府各部领导地位的官员，凡因被告人的公职地位而解除其责任或减刑，皆不予考虑。”而与此相应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章程第6条规定：“被告人在某一时期所处的公职地位，或者被告人遵循其政府、上司的命令行动的事实，都不足以使被告人本身从其被起诉的罪行中摆脱责任。”两相比较为开脱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而删去有关“国家元首”责任的意图便昭然若揭。

^② 《东京审判秘史》，第132页。

政治势力一面竭尽全力继续进行维护天皇制、阻挠民主化的活动，一面又不得不充当协助美国占领日本的驯服工具。美国则一面以民主化指令作为削弱和限制日本统治集团以使之就范的手段，一面又保存和利用除军部之外的天皇制度及其政权机构，以便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控制日本的战略目标。日美两国统治集团既相勾结又存在矛盾，形成日本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从属于美国的关系，是日本有条件投降的必然结果。战后日本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经济从复兴到繁荣，就是在这一复杂的政治格局当中曲折地实现的。

从第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和亚洲太平洋区域各国以及日本本国人民带来的历史灾难，可以认识战后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妄图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倒行逆施可能重新带来的严重危害；透过当前日本右翼分子的倒行逆施，又有助于看清昔日军国主义政权竭力坚持维护天皇制，准备东山再起的深沉意图。这就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重新剖析当年日本败降前后军国主义政权维护天皇制的活动真相及其影响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系）